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文本、記憶與身份——游斌《聖書與聖民： 古代以色列的歷史記憶與族群構建》探析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JIANG, Zongqiang;LI, Yanjun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ISCS)
Download date	2026-07-17 05:37:53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4395

文本、記憶與身份

——游斌《聖書與聖民：古代以色列的歷史記憶與族群構建》探析

姜宗強

西北師範大學中西人文經典詮釋研究基地副教授

李彥君

西北師範大學哲學碩士

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
一追想錫安就哭了。
我們把琴掛在那裏的柳樹上，
因為在那裏，擄掠我們的要我們唱歌，
搶奪我們的要我們作樂，說：
「給我們唱一首錫安歌吧！」
我們怎能在外邦唱雅威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記你，
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
我若不紀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過於我所最喜樂的，
情願我的舌頭貼於上膛

《詩篇》第一百三十七篇這首「以色列人被擄的哀歌」曾經打動多少流落異鄉遊子的心！更何況是身處「階下囚」的境況中；「我們怎能在外邦唱雅威的歌呢？」這裏存在

多麼明確的族群意識和身份意識，即便是在國破家亡的悲慘境地中。這個具有「上帝的選民」稱號的古老而神秘的民族究竟如何看待自身的身份與族群意識，又是如何與此種身份達致自我認同的？帶着對這些問題的好奇，我打開了游斌先生所著的學術專著《聖書與聖民：古代以色列的歷史記憶與族群構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希望管窺蠡測，一探謎底。

一、何謂「以色列」？

當我們問這個事關族群建構的關鍵問題時，我們不禁聯想到一個可以類比的問題：何謂中國人？炎黃子孫？龍的傳人？等等。這些回答中有考古史的問題，如黃帝、炎帝部落構成的華夏族構成了中華民族的祖先；也有宗教神話的問題，如「龍的傳人」。如果我們將考古史看做與族群「外在身份」的「客觀特徵論」相關聯的更加密切；那麼宗教神話所蘊含的神聖敘事則與族群自我認同的「內在身份」的「主觀認同論」相關聯的更密切；考查以色列族群的含義，必定會從這種「內」與「外」的兩重維度去思考。

何謂「以色列」？何謂「以色列人」？這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如果你用很簡單的常識性的回答：「以色列人」是古代閃族人的一支，以亞伯拉罕為祖先。這似乎是簡明的，但又是模糊的。因為，以亞伯拉罕為祖先的古代閃族人的分支，並非只有「以色列」這一個族群。並且，這個從「外在身份」層面所進行的回答，並不能很好地解釋為何「以色列人」自認為是「上帝的選民」這樣一個事關族群自我認知的「內在身份」層面的問題。在《聖書與聖民》一書中，游斌從內（《希伯來聖經》文本的敘事史學、敘事神學）外（古代近東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區考古

史、經外文獻) 結合的角度對「以色列的族群建構」的問題做了精闢地解說，這個解說特別強調「社會記憶史」的研究方法論，從而批評了僅僅從實證主義史學角度對「以色列」的「外在身份」進行解說的治學誤區。書名在我看來，正是要揭示希伯來聖典在建構以色列族群的自我認知的「內在身份」方面的巨大作用，即「聖書」與「聖民」身份建構之間的不可分割的聯繫。

在界定了「民族」與「族群」這兩個概念的區別後，¹ 該書作者指出：人們通常將一群有共同語言、體質、宗教、血緣、風俗習慣等體質文化特徵的人群視作族群，這種「客觀特徵論」的族群理論在二十世紀中期之前佔主流，但由於面臨「問題重重」，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學術界已開始放棄「客觀特徵論」的學術範式，轉為接受族群的「主觀認同論」。「主觀認同論」的範式強調應該重視族群作為「一個人群的主觀認同範疇」。它並沒有拋棄族群的體質及文化特徵，但轉變了看待這些特徵的視角，即：不是由這些體質及文化特徵來決定族群的形成，而是相反，這些體質及文化特徵不過是人群用來表現主觀認同的工具。這樣，它強調的重點不再是外部的所謂的「客觀的」政治的、經濟的歷史，而是人們心靈對於「過去」的選擇性「記憶」，這種「記憶史」並不一定是客觀真實的，但對於這個族群卻有可能是具有終極意義。因此，造成一個族群的，並不是所謂的「歷史事實」，而是蘊含在歷史敘事之中的或真實或虛構的「集體記憶」。² 所以，該書作者認為蘊含在《希伯來聖經》中的敘事史學、敘事神學保留了古代以色列人的「集體記憶」與「社會記憶」，這些「集體記憶」

1. 游斌，《聖書與聖民》，頁6。

2. 同上，頁30-32。

與「社會記憶」「體現了古代以色列人對自我族群「內在身份」的探索與定位。該書作者指出：

「以色列人」這一族群的起源與變遷，其奧秘就在作為「社會記憶」的《聖經》文本之中。《聖經》文本史就是社會記憶史，社會記憶史就是族群史。「層累的《聖經》以色列史」是不同時代、不同人群為塑造或詮釋「以色列人」的本質而形成的社會記憶。³

總之，從「社會記憶史」的視角去理解「層累的《聖經》以色列史」，是開啟發現「以色列」的內涵、即這個族群內在精神層面含義寶藏的金鑰匙。

二、「層累的《聖經》以色列史」

在「《聖經》以色列史」研究方面，學術界存在「極大主義」與「極小主義」之間的爭論，游斌用「信古派」與「疑古派」這兩個詞比擬「極大主義」與「極小主義」。「極大主義」相當於「信古派」，主張記載在《希伯來聖經》中的以色列古史具有極大的可信性，不僅大衛、所羅門王朝是真實可信的，而且士師時期的歷史、甚至出埃及也是相當可能的事件。「極小主義」則相當於「疑古派」，主張記載在《希伯來聖經》中的以色列古史具有極小的可信性，它更像是小說、故事、傳說，而非歷史，不具有歷史的真實性。不僅有關先祖的傳說、出埃及事件難以具有歷史的真實性，即便大衛、所羅門王朝的真實性存在都是值得懷疑。在主張「極小主義」的學者看來，記載在《聖經》中的以色列古史充其量是由後流放時期耶路撒冷的一

3. 同上，頁 32-33。

群祭司與文士空想而編纂出來的，因而不具有寫作「客觀真實歷史」的價值。寫作「客觀真實」的以色列古史只能以考古學、經外文獻作為材料來源，而必須對《聖經》文本中的這些傳說、故事、小說棄之不用。⁴

「極大主義」與「極小主義」之間的爭論既牽涉到如何理解「《聖經》以色列史」的性質，也牽涉到《希伯來聖經》的文本材料的複雜構成。根據近代《聖經》批判學術的奠基人威爾豪森（Julius Wellhausen）的觀點，《聖經》文本材料是由不同年代、不同性質的材料累積而成的。例如，構成「五經」的材料至少就是由 J、E、D、P 四種不同年代、不同性質的底本材料累積而成，所以游斌借用「層累的」的這個詞說明「《聖經》以色列古史」資料來源的性質和特徵，可謂生動準確。但是，也正是這個「層累性」造成了很多麻煩。如同考古地層，壘在最上面的恰恰是時間上最新的；壘在《希伯來聖經》最前邊的「五經」中有關天地創造、先祖亞伯拉罕的敘事等等，恰恰是五經中時間上最晚、最後形成的。一般認為是遲至被擄後期、甚至更晚時期才最終編輯完成的。因此，如同在研究「《聖經》以色列史」方面學術界存在「極大主義」與「極小主義」之間的爭論，在研究以色列族群問題的文本材料的選擇上也存在「五經」敘事材料為主，還是「先知材料」為主的爭論。⁵這個爭論背後隱含着一個學術界並沒有取得共識的問題，究竟是「五經」中的 J、E 底本材料對於研究以色列族群問題更可靠、更有價值，還是西元前八世紀先知的材料更可靠、更有價值？史料的不同選擇有可能決定不同的研究傾向及其所帶來的不同結論。

4. 同上，頁 22-23。

5. Kanton Sparks, *Ethnicity and Identity in Ancient Israel* (Winona Lake, IN: Eisenbrauns, 1998), p. 320.

斯巴克 (Kenton Sparks) 根據先知書的材料對以色列族群起源及性質的重構，可以幫助我們對這個問題有快速而短暫的一瞥。⁶據有可靠的考古證據所證明的經外文獻表明，以色列 (Israel) 這個詞第一次出現在大約西元前十三世紀著名的埃及法老邁尼普塔 (Mernepath) 碑銘上，以色列這個詞的詞尾 el 表明它與古代近東神祇 EL 的密切關聯。《聖經》文本中的「底波拉之歌」(《士師記》五章)，並不否認其經文內部包含更古老的傳統源流，但文本最後形式的形成大概是在西元前九世紀，距離邁尼普塔碑銘已經三百多年後。在「底波拉之歌」中提到了以色列的「支派聯盟」，似乎暗示了這些不同的支派是因為對雅威的共同忠誠的義務而聯結成一個同盟。並且，「底波拉之歌」強調了以色列族群與迦南族群的爭戰及對立。接下來較為早期的材料就是西元前八世紀的先知文本。體現北部傳統的《何西阿書》側重強調「雅威一神崇拜」(mono-Yahwist)，而將對其他神祇的崇拜統統歸結為「外來的」、「外族的」加以拒斥，顯示了很強的族群邊界意識。同時代的南部先知阿摩司並沒有分享這個北部傳統，與其說阿摩司強調以色列與外族的區別，不如說他更強調兩者的一致性，強調兩者共同處於雅威普世的治權之下(摩 9:7)。西元前七世紀的《申命記》材料很可能與北國被亞述滅亡後，逃亡到南國的那部分北國難民密切相關。這些材料除了繼續強調《何西阿書》中所側重強調的「雅威一神崇拜」，還特別列舉了哪些是、哪些不是雅威信仰的特徵，從而聚焦在雅威與以色列之間獨家的約關係上。但是，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申命記》反對「外族」的爭論大多並非反對某種特定的外族人或外國人，而是反對被冠名的「外來」宗教因

6. 同上，頁 320-325。

素，將之歸結為非雅威信仰或已經腐化了的雅威信仰。這種對「外來宗教」因素的譴責，在清楚地劃定可靠的雅威信仰和「外國、外族」宗教活動界限的意義上，成為區分以色列族群的標記。

《耶利米書》反映了猶大君王制末期和被擄巴比倫的流放早期的情形，耶利米似乎追隨了何西阿的傳統以及《申命記》的模式，更多地譴責假定的外國宗教的影響，而非外國人種。但是，耶利米並沒有使用像割禮、守安息日這些禮儀特徵作為劃分族群的標籤，至少割禮並沒有被耶利米視作獨特的以色列人的實踐，而是周圍鄰族共同具有的禮儀。但是，到了《以西結書》所代表的流放早期，所有這些都發生了變化。在《以西結書》和「聖潔法典」中，割禮、守安息日以及儀式上的潔淨都成為了流放社群區分於外族獨特的、重要的族群標誌。所有這些都表明在流放早期，由於遭受巴比倫侵略，流放社群在被擄掠到外國處境下努力保存自身猶太社群身份的動機所引起族群意識的強化，這正是本篇開首《詩篇》第一百三十七篇所反映的流亡處境。

與早期流放社群正相反，「第二以賽亞」所在的後流放期的社群不再將流放處境視作是對倖存的以色列人的威脅。但是，這並不是說「第二以賽亞」對以色列的族群性質是盲目的，恰恰相反，他在更高程度上發展和改進了族群性質的含義。「第二以賽亞」的無與倫比之處在於：他熟練地運用了出埃及、以撒、雅各和亞伯拉罕的傳統，但是，他並不是將這些傳統與流放早期的族群隔離主義相關聯，而是以更高的普世主義視野去界定以色列族群的性質，這種界定也反映在幾首「僕人之歌」中。這種普世主義的視野在被擄回歸後的社群中仍然可以發現它的支持者（見「第三以賽亞」）。但是，對土地與資源的嚴酷競爭

會很自然地強化猶太人自身的族群身份意識，並且後流放期的族群隔離主義者（以斯拉－尼西米）似乎戰勝了「以賽亞派」而贏得了當時的勝利。⁷並且還有文本資料顯示，以色列族群內部也存在爭執和衝突，被擄巴比倫的回歸社群與留在土地上的遺民社群之間為了爭奪土地、財產及資源，都爭先以亞伯拉罕的正統自居。⁸

斯巴克上述關於以色列族群起源及性質的歷史重構最終強調了兩點：（一）在猶大和以色列人建構族群的視野中，建構雅威信仰的宗教身份似乎比建構宗族血緣身份更重要；（二）即便是在具有較多「排外」修辭性質的族群材料中，如《申命記》、《以斯拉記》、《尼西米記》中，以色列人對於將外族人吸收同化到自己的宗教社群中依然表現出了強烈的興趣。⁹這個重構為我們理解《聖經》以色列族群觀的發展綫索提供了一個簡明的輪廓。但是，這些研究沒有完全能夠從「內在倫理」的層面將「以色列」的神聖含義澄明。所以，還需要由「社會記憶史」的角度去進一步澄明「以色列」所包含的「內在倫理」、「精神信仰團體」的含義。

三、超越「層累的《聖經》以色列史」

游斌強調研究層累的《聖經》以色列古史，無論是「極大主義」，還是「極小主義」都沒有能擺脫實證主義史學標準的窠臼與局限。¹⁰《希伯來聖經》所反映「以色列古史」的性質不是實證主義史學所強調的客觀性座標，而是敘事

7. 以上主要建立在先知書材料基礎上的對以色列族群觀念發展史的重構，均見 Sparks, *Ethnicity and Identity in Ancient Israel*, pp. 320-325。

8. Archie C. C. Lee, "Polyphonic Voices in the Bible", in Philip L. Wickeri (ed.), *Scripture, Community, and Mission*, (Hong Kong: Christian Conference of Asia, 2002), pp. 182-186.

9. Sparks, *Ethnicity and Identity in Ancient Israel*, p. 325.

10. 游斌，《聖書與聖民》，頁 23。

史學、敘事神學所反映的「意義性」座標。打個比方，《希伯來聖經》所反映「以色列古史」的性質不是「實證性」的玄奘《大唐西域記》，而是「意義性」的《西遊記》。從這種敘事史學、敘事神學的視角反省「極大主義」與「極小主義」的爭論，可以為我們超越實證主義史學視域標準下的「層累的《聖經》以色列史」，開闢出一條不同的理解以色列族群身份的新鮮視域。這個新鮮視域就是：以敘事史學、敘事神學的標準去批評實證主義史學的獨斷，以「社會記憶史」的方法論視角去詮釋「層累的《聖經》以色列史」，去解釋以色列族群觀念的形成。

下邊我們舉例來看一看這種「社會記憶史」的方法論視角下對以色列族群性質的理解與「實證主義史學」的方法論視角理解下的以色列族群性質究竟有何不同？我們首先舉有關以色列人族源記憶的「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敘事為例（見該書第二章）。

根據斯巴克的研究，在先知書卷材料中，最早、最大量出現的傳統恰恰不是「亞伯拉罕」的傳統，而是「雅各」的傳統，「以撒」的傳統只是蜻蜓點水般的一筆帶過，¹¹似乎是為了起到連接亞伯拉罕、雅各這三代人的家族譜系的功用。這個判斷與游斌關於先知書卷中七次談到亞伯拉罕，三次談到以撒，八十七次談到雅各的文本字詞統計相吻合。¹²為何會出現這種情形，這三個傳統的先後關係如何？這是一個極難回答的問題。根據克萊蒙斯（R. E. Clements）的研究，亞伯拉罕約傳統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前以色列時期，即「出埃及」之前。亞伯拉罕的口傳傳統最初出現在南部希伯崙，這個傳統在大衛—所羅門統一

11. Sparks, *Ethnicity and Identity in Ancient Israel*, p. 327.

12. 游斌，《聖書與聖民》，頁 58。

王國時期被利用說明大衛國興起的合理性。但是，直至巴比倫被擄亡國後，亞伯拉罕的傳統才真正被從遠古的時代中挖掘出來被新流放、後流放社群在新的處境下去使用。¹³這與先知書卷中亞伯拉罕七次出現大多與流放、後流放的處境相關的文本中的情況相一致。¹⁴因此，作為以色列十二支派聯盟祖先的「雅各」的書寫傳統應該是較早出現的，亞伯拉罕的書寫傳統是遲至被擄、後被擄期才上升成為主流的社群傳統。「以撒」的傳統三次出現，其中有兩次是出現在《阿摩司書》中（7:9；7:16），足見這一傳統的古老。「以撒」的傳統成為聯接「雅各」的傳統與可能以口傳形式出現的更加古老的「亞伯拉罕」傳統的中介，於是最終形成了「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三族族源記憶的層累與融合。在《聖書與聖民》第二章中，游斌首先考察了信古派與疑古派，也就是「極大主義」與「極小主義」之間的爭論及各自的證據，力求全面兼顧。但是，他又不囿於實證主義的窠臼，嘗試提出自己關於先祖敘事的社會記憶之詮釋。游斌指出「三族族源記憶的層累與融合」落腳在南北以色列人構成一個族群整體的觀念上，「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作為一個整體的片語在「五經」中出現了十四次，在歷史書中出現了四次，說明以色列族群在回憶歷史時，將之作為以色列族群的血緣源頭。¹⁵但是，「三族族源記憶的層累與融合」的意義不僅限於此，這種以「父子」關係為紐帶的族源敘述與「十二支派聯盟」的以「兄弟」關係為紐帶的族源敘述結合在一起，豐富着我們對以

13. R. E. Clements, *Abraham and David: Genesis XV and its Meaning for the Israelite Tradition*, (Naperville: A. R. Allenson, 1967).

14. 分別是《以賽亞書》二十九章 22 節；四十一章 8 節；五十一章 2 節；六十三章 16 節；《耶利米書》三十三章 26 節；《以西結書》三十三章 24 節；《彌迦書》七章 20 節。

15. 游斌，《聖書與聖民》，頁 438。

色列族群起源的多元認識。¹⁶並且，其最終意義還不在於此，而在於「雅威介入人類歷史，但他真正揀選一群人或一個家族而開啟神人之間的互動關係」，¹⁷雅威成為「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這成為理解以色列人作為「上帝的選民」之自我身份定位的關鍵。

根據筆者的理解，雅威成為「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與五經中的《創世記》文本關聯密切。學者普遍認為《創世記》一至十一章從宇宙史、世界史到民族史的敘事方式，至少是在被擄巴比倫之晚期形成的。《創世記》一至十一章從而包含着更加恢弘開闊的國際視野，體現形式之一，就是將「上帝創世」的宇宙史和「變亂口音」的世界史也納入到以先祖亞伯拉罕為首的以色列民族史的敘事方式中。《創世記》與《以賽亞書》四十至四十五章中都提到「創造」一詞，這從某種方式上預示了先知傳統，尤其是《以賽亞書》四十至四十五章中「新天新地」、「新民」、「新的以色列」、「新事」等普世主義的觀念對後流放社群族群觀念和先祖傳統的影響。這也從某個側面映證了上述游斌想要從「社會記憶史」角度得出的結論：實際上，「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顯示的不僅僅是血緣意義上對以色列族群的認同，還有更高的神學倫理意義上的認同，即，在被擄後期存在着先知傳統試圖將亞伯拉罕的立約傳統突破至以色列族群界限之外，而擴大到更加廣闊的外邦世界中的含義。這個含義就是先知傳統中所說的「新天新地」、「新民」、「新的以色列」、「新事」的含義，這個「新的」族群應該是一個超越了血統的擴大了的精神倫理信仰的共同體。

16. 同上，頁438。

17. 同上，頁70。

限於篇幅，第二個舉例說明會更洗煉，即，關於「十二支派聯盟」的族源敘述（見該書第六章）。實證主義史學關注的重心在於，關於「支派」名稱和數量的前後文本記載不統一。解決辦法也是實證性的，如有學者將「十二」這個固定的數字格式歸結為借鑒了古代希臘 *amphictyonies* 同盟數位格式「十」的影響。¹⁸游斌則使用「社會記憶的詮釋」，認為這種傳統前後不一致的原因「是一個不斷按照現實而修改的歷史記憶」，是不同時代不同處境下社群團體為了詮釋說明當下的現實，「曾經的某些記憶被遺忘」，「某些記憶則被發明出來」的結果。¹⁹

總之，整本書的結構安排，都按照先列舉「信古派」和「疑古派」各自的證據，然後加以公允的評說，最後提出作者的「社會記憶史的詮釋」，從而超越實證主義史學對大大小小的以色列傳統的詮釋局限。這些大大小小的傳統包括「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敘事、出埃及敘事、征服迦南敘事、《士師記》的古史記憶、支派聯盟的起源敘事、統一王國的歷史敘事、北國以色列和南國猶大的歷史記憶、流放時期的歷史編纂、回歸群體的「神治社會」及其歷史編纂。游斌使用「社會記憶史的詮釋」，可以使實證主義史學標準下的這些文本材料不再變成僵死的斷片和史料，而是鮮活的歷史記憶和故事，是社群為探索自我身份和生存意義的苦苦追尋和盼望；「層累」正說明一代又一代社群對於自身身份的不斷選擇和自我塑造。這些「社會記憶史的詮釋」集中說明的核心在於：通過《聖經》敘事表現出的層累的以色列史，是歷史記憶，而非僅僅是歷史事實。它雖然講述的是猶太—以色列族群的故事，但它

18. Sparks, *Ethnicity and Identity in Ancient Israel*, pp. 325-326.

19. 游斌，《聖書與聖民》，頁 232。

又不僅僅是一個民族史，所有這些故事都被演繹為宇宙之終極主宰與他所揀選、所愛子民之間的關係，永恆地表達了一群人在宇宙中最終歸宿何在的命題。²⁰

在筆者看來，游斌堅持以「社會記憶的《聖經》以色列史」替代「實證主義史學的《聖經》以色列史」去詮釋和定位「以色列」族群身份，關鍵點在於：他堅持不應該化約掉「以色列」作為「上帝子民」的「內在身份」以及其中蘊含的神聖的含義。游斌認為：這種族群身份的含義既是一種歷史的選擇和建構，也是一種神聖的呼籲和召喚；一旦一個人同意這種神聖含義所蘊藏的對生命經驗和生命意義的解釋，一旦決定回應和認承這種呼籲和召喚時，他就成為一個超越了血緣人種界限所規定的國族的以色列人，而成為一種大寫的「以色列人」，一個在上帝面前的「新民」。²¹質言之，「以色列」不僅是一個血緣族群的共同體，而且更是一個超血緣族群的倫理共同體、精神共同體、信仰共同體。文本的「層累」正說明這一信仰群體在不同時代的生活處境中對於族群本質的不同理解和不斷詮釋，這些多元詮釋層累於同一個「《聖經》空間」之內，使得「以色列人」的族群內涵十分豐富歧義，漫長的猶太—基督教大傳統之內的眾多派別和分支都能從中找到自己的理想本質。²²這就是游斌通過對「聖書」的詮釋，對「何謂聖民」、「何謂以色列」這個族群身份問題的解答。

四、方法論上的特色

該書作者在研究方法論上的特色集中在對實證主義歷史觀的批判和超越上，即使用「社會記憶史」的研究方法論。

20. 同上，頁 438。

21. 同上。

22. 同上，頁 33。

這種新的方法就是將「以色列人」的起源討論從「實證主義」的爭論中轉移到以「社會記憶」為核心概念的族群學說中。作者在書中所用「層累說」的詞語是借用顧頡剛先生研究中國古史時所提出的專業術語，作者吸收和轉化顧頡剛先生「層累說」的特色，在書中提出「層累形成的《聖經》以色列古史」有四個特點：（一）《聖經》的以色列古史是層累地形成的，事件發生的次序與敘事文本的形成的次序之間有相當大的衝突。（二）歷史越往後發展，《聖經》敘事的古史期越往前推。（三）歷史發展越長，古史敘事中的中心人物的形象越來越多元豐富。（四）研究跨層累之間的關係比確定某一文本層的特定時代更有意義。

作者採用的「社會記憶史」的研究方法論深受國內學者王明珂的影響，基本要點有四：（一）一個社會群體總是選擇、組織、重述「過去」，以創造一個群體的共同傳統，來詮釋該群體的本質及維繫群體的凝聚；（二）記憶是一種集體社會行為，每一種社會群體皆有其對應的集體記憶，借此該群體得以凝聚及延續；記憶常常是選擇性的、扭曲的或是錯誤的；（三）一個族群的形成，是在特定的社會經濟情境中，一些人以共同族源來凝聚彼此，遺忘與現實人群無關的過去（結構性失憶），並強調共同的起源記憶與特定族稱以排除異己，建立並保持族群邊界；（四）族群不只是個模糊的集體現象，它是每一代經由每一個人（尤其是撰史者）重新詮釋而成。²³

作者對「社會記憶史」研究方法論的使用，使得《聖經》文本在歷史考古，經外文獻，歷史文學批判以及社會學—人類學理論模型這四重證據的分析中越來越飽滿、越來越豐富；對文本中各種不同敘事傳統的細緻分析如同一條條分散

23. 同上，頁 32。

的水系，最終匯聚在「何為以色列」這個族群問題的「源頭」上來；從而該書對《希伯來聖經》文本的解釋空間也越來越宏大，使得讀者對形成以色列族群起源傳統的多元性認識得越來越清晰。作者在將研究重心轉移到分析《聖經》敘事本身的「社會記憶」上來的同時，又能對《聖經》考古學界的發現加以採納、吸收和公允的評價，這就使得本書探索最終所獲得的結論讓人覺得別開生面而又厚重不失正統。在筆者看來，這種博採眾長的方法論是本書最大的特色和亮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考古學方面，《聖書與聖民》基本囊括了近現代學者關於《聖經》考古和經外文獻的重要研究成果，並對這些成果做了詳細的梳理和吸收。在書中不僅可以看到作者對於這些成果的引用是站在客觀分析的前提下，而且書中的地圖，考古實物圖片都經過了作者的簡明處理，清晰明瞭。作者所做的這些功夫以及書末所附《聖經》考古學及經外文獻的專業書籍、文獻索引，對於初涉這一領域的學者和研究者一定大有裨益。

最後要談一點不同的看法：人類學—社會學理論模型在《聖書與聖民》這部著作中的應用，例如，模擬血親理論、邊緣—核心模式在分析論證中都有成功的運用，但該書對族群與族群之間的衝突、族群自身內部的多元社群傳統之間的分歧對身份建構的影響講得不夠。實際上，在被擄後期，尤其是回歸後，不僅存在以色列民中被擄巴比倫社群與巴勒斯坦原地社群因為「土地」而起的爭執和衝突（結 12:14-18）²⁴；而且，還存在着祭司傳統與先知傳統的衝突、²⁵亞伯拉罕的傳統與摩西的傳統誰為正統的爭執，²⁶這

24. Lee, "Polyphonic Voices in the Bible", pp. 182-186.

25. 參見 P. D. Hanson, *The Dawn Apocalyptic: The Historical and Sociological Roots of Jewish Apocalyptic Eschatology*,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9).

26. 參見姜宗強，〈回歸社群內部的分歧與不和〉，載田海華編，《經典與詮釋》（成都：

些包含政治、經濟因素的衝突和爭執都會影響到社群的分裂以及對社群身份建構的不同理解。例如，有學者結合中國處境對中國北朝高歡的渤海高氏家譜與《歷代志上》二十六章記載的利未守門人家譜的跨文本研究表明，歷史動蕩衝突時期身份認同、包括族群認同的問題相當複雜，身份和家譜也可能偽造，利未人接受守門人這個不同的群體進入自己的家譜，這種身份認同可能更多出於實力權力的權衡，「血緣、信仰等傳統認為的身份認同因素似乎便不那麼重要了」。²⁷這尤其表明，歷史過程中身份認同因素的多面性，有「神聖」層面上的認同；也有「世俗」意義上的考慮。就此全面性而言，《聖書與聖民》對於族群和身份建構的世俗經濟政治層面的因素、尤其是衝突與不和諧的因素考慮和着墨得不夠。也許，這是該書一個需要稍稍加強論述和補充的方面。因為，「美美與共」的不同族群和諧相處的神聖理想如果要實現並建立於人間的地基上，就必須正視不同族群、甚至同一族群內部分歧與衝突的現實，而《希伯來聖經》文本中的這一層面的含義也應該被重構和揭示出來，以供研究今天的族群分歧、群際衝突可資借鑒。

關鍵詞：社會記憶史 誰是以色列 族群理論
實證主義的局限

作者電郵地址：jianminyue.ly@163.com（姜宗強）

yanjun90987@126.com（李彥君）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頁 288-304；〈論摩西約傳統與大衛—亞伯拉罕約傳統之間的張力〉，載 MENG Zhenhua (ed.), *Understanding God in the 21st Century* (Vanguard, 2013), pp. 189-205。

27. 孟振華，〈在中國處境下對《希伯來聖經》家譜的跨文本閱讀例證〉，載《西北師大學報》4（2013），頁 10。

Text, Memory and Identity:

A Preliminary Study of You Bin's *Holy Book and Holy People: Historical Memory and Ethnic Construction in Ancient Israel*

JIANG Zongqiang

Associate Professor

Hermeneutic Center for Sino-Western Classics Text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I Yanjun

M.Phil.,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his book *Holy Book and Holy People*, You Bin challenges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ism by the methodology of “a history of social memory”. He focused on the problem “Who is Israel” and discussed the limitation of positivism. He made his interpretation to the Biblical text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evidences from archaeology, extracanonical literatures, histor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He also absorbed and evaluated the discoveries of biblical archaeology, which made his exploration and elaboration in his book vivid.

Keywords: A History of Social Memory; Who is Israel;
Theory of Ethnicity; Limitation of Positivism